

杨里昂著

中
國
新
詩
史
話



湖南文艺出版社

詩中
史話
新



中 国 新 诗 史 话

杨里昂 著

〔湘〕新登字002号

中国新诗史话

杨里昂

责任编辑：龚笃清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5

字数：212,000 印数：1—5,600

ISBN 7—5404—0983—5

平装：I·785 定价：3.80元

ISBN 7—5404—0984—3

精装：I·786 定价：5.80元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和北伐战争时期.....	(1)
第一节	《新青年》倡导诗歌革命.....	(3)
第二节	“五四”运动扩大新诗战果.....	(11)
第三节	新诗理论初步形成.....	(19)
第四节	文研会鼓吹“血与泪”的诗歌.....	(27)
第五节	创造社标榜诗歌浪漫主义.....	(35)
第六节	新诗界抨击复古主义.....	(43)
第七节	“为人生”派与“为艺术”派展开诗争.....	(50)
第八节	小诗运动迅猛发展.....	(57)
第九节	“湖畔”诗人致力爱情诗创作.....	(65)
第十节	共产党人提倡革命诗歌.....	(73)
第十一节	新诗坛引进象征主义.....	(81)
第十二节	《晨报诗刊》探讨新诗格律.....	(89)
第十三节	散文诗创作出现热潮.....	(97)
第二章	十年内战时期.....	(105)
第十四节	普罗诗歌在斗争中崛起.....	(107)
第十五节	新月诗人继续形式试验.....	(115)

第十六节	现代派诗蔚然成风	(122)
第十七节	中国诗歌会致力大众化	(129)
第十八节	现实主义诗歌再放异彩	(136)
第十九节	国防诗歌运动席卷全国	(143)
第二十节	晦涩诗风引起激烈论战	(150)
第二十一节	进步诗人为纠正粗制滥造而斗争	(158)
第二十二节	新诗研究初出成果	(165)
第三章 抗日战争前期		(173)
第廿三节	诗歌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175)
第廿四节	诗歌朗诵运动持久开展	(183)
第廿五节	民主根据地推广街头诗	(191)
第廿六节	通俗诗歌创作再掀高潮	(198)
第廿七节	诗歌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争鸣	(206)
第廿八节	“七月”诗派饮誉文坛	(213)
第廿九节	公式主义诗歌招致批评	(221)
第卅十节	抗战诗歌引入多种艺术	(229)
第卅一节	长篇叙事诗创作获得丰收	(237)
第卅二节	沦陷区流行朦胧诗	(245)
第四章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253)
第卅三节	延安诗人参加文艺整风	(255)
第卅四节	华北各地开展翻身诗歌运动	(262)
第卅五节	国统区诗人致力“人民诗歌”建设	(269)
第卅六节	政治讽刺诗推动民主斗争	(277)
第卅七节	“九叶”诗派再倡现代主义	(285)
第卅八节	全国诗歌界实现大联合	(293)

第一章

“五四”和北伐战争时期

(1917——1927)

第一节 《新青年》倡导诗歌革命

中国新诗兴起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它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源头可上溯到上世纪末叶。

清朝末年，政治越来越腐败，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加深，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日益加剧，一些最先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革政治，于是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的发动。为着启迪民智，传播其改良主义的需要，针对当时死气沉沉的文坛，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诗界革命”，主张作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强调“我手写我口”，“不名一格，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黄遵宪）。从1896年起，他们推出一批“新学之诗”。这些诗作，扩大了题材范围，溶入了新的思想，弘扬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艺术上从歌谣中吸取营养，采用方言俗语，给旧体诗注入了生机。冲击了清代诗坛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的复古主义歪风，为诗歌革命开了先声。但是，他们强调“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不过是“旧瓶装新酒”，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中国诗歌。同时，他们的所谓“新精神”，也只是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那一套货色。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兴起，它越来越成为时代的阻力。到本世纪初叶，“诗界革命”遂不得不偃旗息鼓。正如郁达夫后来批评的那样：“以旧式古体诗来表达新思想新事物，但结果终觉得是不能畅达，断没有现在的无韵新诗那么的自由自在。还有用新词入旧诗……可是半新不旧，即使勉强造成了五个字或七个字的爱皮西提，也终觉得碍眼触目，不大能使读者心服的”（《谈诗》1934年6月）。创造思想和形式全新的诗歌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后起者的肩上。

继诗界革命之后，最先在创造新诗方面作出努力并取得积极成果的是胡适。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于1910—1917年留学美国。从1915年起开始考虑文学改良问题，决心以诗歌作为突破口。胡适开始也是走的诗界革命的老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未脱郁达夫说的那些弊端。1915年9月，他在一首题赠诗中用了不少外国字的译音，他的同学任永叔把这些字连缀起来，做成一首诗回敬他：“牛敦爱迭生，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土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但胡适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近两年的摸索，他从美国近代自由诗运动得到启发，提出新的诗歌革命的主张。美国的自由诗运动发轫于惠特曼（1819—1892），他的《草叶集》突破了传统诗歌的严格韵律，采用近代口语作诗。到本世纪初自由诗运动在美国形成大潮。1914年前后，意象派诗人提出六大信条：一、用寻常说话中的字句，不用死僻的、古文中的字句；二、求创造新的韵律以表现新的情感，不死守规定的韵律；三、选择题目有绝对自由；四、求表现出一个幻象，不作抽象的话；五、求作明切了当的诗，不作模糊不明的诗；六、相信诗的意思应当集中，不同散文里的意

思可作松散的排列（见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诗》1卷2期）。其时正在美国的胡适，深受其影响。意象派的这些信条成了胡适诗歌革命的理论基础。1916年，胡适将几年来形成的文学改良主张归纳为“八事”，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寄给国内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深得他的赞同。《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为本名），以反对旧政治、旧伦理、旧艺术，提倡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1917年1月，陈独秀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5期上，接着他自己又作了《文学革命论》刊载于该刊第2卷6期。《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两文，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新青年》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半农、钱玄同等相继发表了重要意见。他们在文章中集中揭举了旧文学，特别是旧诗词的种种弊端。胡适指出，旧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呻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近世文人沾沾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他指出文言诗词采用的是“半死的文字”，不能很好地表达今人之情感（《文学改良刍议》）。刘半农说：“现在已成假诗的世界，或专讲声调格律，或引古证今，或专在性情上用功夫。诸如此类，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3卷5期）他认为旧诗格律过严，“束缚思想过甚”，“诗学决无发达之望”（《我之文学改良观》，第3卷3期）。针对旧诗词存在的这些弊端，他们大声疾呼诗歌必须进行改革。其要旨是：在精神上应突出一个“真”字，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呻吟之作。在工具上，应采用现代活的文字，以白话入诗，“不避俗字”，“不用典”。在形式上，他们提出“诗须废律”的目

号，主张诗歌格式“长短任意，仿古创新，均无不可”（钱玄同：《寄胡适之》5卷2期）。刘半农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是增多诗体，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三是以方言填词，今语作曲（《我之文学改良观》，第3卷3期）。他们的这些意见，从内容、形式、工具上，指明了诗歌改革的方向。与“诗界革命”同仁的改良主义路线迥然不同，它富有战斗精神和革命意义。既合乎世界新诗运动的潮流，又切合国内诗坛的实际，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探讨诗歌革命理论的同时，《新青年》发表了最早的一批白话诗。1917年2月该刊第2卷6期，首次出现以“白话诗”名目的诗作。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1期实行全面革新，大部份文章改用白话，采用新式标点。这期刊物首次开辟新文艺栏，集中发表了白话诗9首，它们是：胡适的《人力车夫》、《鸽子》、《景不彷》，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惠周岁生日造像》。从此以后，《新青年》几乎每期都刊载白话诗，从1918年4卷1期至1921年1月9卷6期改刊，两年半时间中共发表著译白话诗130余首。这些诗作，采用现代语言，大部份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采用长短不一的句式。同时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内容，展现出与旧诗完全不同的风貌。

胡适、刘半农、沈尹默是《新青年》诗人中的三员主将。他们在刊物上发表的诗作最多，影响也最大。胡适是以白话作诗的第一人。他发表在《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的白话诗于1920年3月结为《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是新诗史上第一部个人专集。诗集中最早的一首《蝴蝶》作于1916年8月。全诗八句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可以代表《尝试集》第一编，即1917年回国之前诗作的作风。正如胡适自己所说“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虽无对仗，也没有严格的平仄，但基本保留着五、七言的句式和韵律，严格地说，只是一些“白话韵文”而非新诗。经过他不断尝试，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自己说《关不住了》是他“新诗成立的纪元”，这首译诗采用散文的句式，作于1919年8月，距《尝试集》中的第一首诗刚好三年。作为第一个白话诗人，胡适的大胆创造，不断求索的精神是难能可贵且卓有成效的。钱玄同称他的《尝试集》“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感情，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尝试集序》），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名复，以字行）早年在上海从事文学和戏剧工作，曾用文言翻译过外国诗歌，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1917年开始白话诗写作。周作人称他和沈尹默是《新青年》中两个“具有诗人天分”的诗人，他的成功在于“驾驭得住口语”（《扬鞭集序》）。刘半农主张增多诗体，先后进行过无韵自由诗、散文诗、歌谣体、长抒情诗、小诗多种形式的试验，他自己说过“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其中以歌谣体最有特色。1918年他与钱玄同、沈尹默等发起征集全国各地歌谣，出版歌谣专刊，从民歌中学习、吸取营养，

并且用江阴话试作了一批拟山歌。他的诗后结为《扬鞭集》和《瓦釜集》分别于1926年10月和4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刘半农的诗以表现下层劳动者的生活为主，显示了平民的风格。沈从文说他的诗“以一个散文的形式，浸在诗的气息里，平凡的看，平凡的叙述，表现一个平凡的境界，这手法是较之与他同时作者的一切作品为纯熟的”。认为他用江阴方言写的山歌“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他的成就是空前的”（《评刘半农的〈扬鞭集〉》）。沈从文的这些话不无溢美，但从民间诗歌探索新诗发展道路，刘半农是第一人，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镜。

沈尹默（1883—1971，原名沈君默，祖籍浙江吴兴），早年留学日本，1913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1917年开始新诗创作。他的旧诗根底十分深厚，但却是白话诗人中最早突破旧诗窠臼的一人。他发表在《新青年》4卷1期上的《月夜》，是他的新诗处女作，完全用的散文的句式，全诗仅四句——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的确看不出旧诗词的痕迹，因而被《新诗年选》的编者称为第一首“具备新诗美德”的作品。沈尹默又是散文诗的最初作者，他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三弦》，意境新颖，音律谐和，尤其被诗人们称道，胡适称它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谈新诗》）。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批新诗以后，便不再作白

话诗，后以旧诗和书法名世。但他早年为新诗作出的贡献是不应埋没的。

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笔名启明)也是《新青年》上的两位重要诗人。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于1907年发表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海涅、密兹凯维支、裴多菲等一批西方民主主义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呼唤中国诗坛效法摩罗诗派创造具有反抗精神的“伟美之诗”。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同期，以“唐俟”的笔名刊出自话诗三首：《梦》、《爱之神》、《桃花》，以后又发表《他们的花园》、《人与时》等诗作。后来他谦逊地说过当时自己只是为新诗“打打边鼓”，其实他为数不多的诗作，在《新青年》诗作中别具一格，有着鲜明的讽喻特色，《桃花》是新诗中的第一首讽刺诗。他的新诗不是写实的，而采用了一些象征手法。完全不受旧诗词的束缚。在这两点上，周作人有与他相似之处。周作人于1919年2月在《新青年》6卷2期发表处女诗作《小河》，立刻受到一迭连声的赞美。这首诗全长57行，是初期新诗中第一首长抒情诗。他自己说形式上受法国象征诗人波特莱尔散文诗的影响。胡适称它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诗体词调所能传达出来的”(《谈新诗》)。

除上述几位，在“五四”运动之前发表新诗的还有陈独秀、李大钊、陈衡哲、沈兼士等人。陈独秀、李大钊是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有力地支持了诗歌革命。陈衡哲(1893—1976，湖南益阳人)是新诗坛上第一位女诗人，她在留学美国期间，受胡适的影响，开始新诗和白话小说的创作，

她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鸟》一诗，可算是新诗中最早的一首女性解放之歌：

我若出了牢笼，
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筋疲力竭水尽山穷，
我便请那狂风，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展现了诗歌革命的最初实绩，而且也是新文学运动的首批产儿。白话诗的尝试的成功，使新文学从一向被认为是“文学中的文学”的诗歌领域打开缺口，冲破了文言诗文的一统天下，因而它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节 “五四”运动扩大新诗战果

中国的白话诗是新思潮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成了民主的载体，促进着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在这种革命的过程中，新诗本身也借以不断强大。在1919年以前的文坛上，仅有《新青年》一家刊物在作白话诗的独唱，音量虽然不大，但它却是时代之声，因而能随着新世纪的东风，吹遍四方，在1919年，即“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一年，终于成了气候。

继《新青年》之后，最先发表白话诗的有《每周评论》和《新潮》。《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也由陈独秀主编，可以说是《新青年》的一种补充。它所载白话诗的作者也即《新青年》诗人群中的胡适、周作人（仲密）和刘半农（寒星）等人。《新潮》创刊于1919年1月1日，它是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的会刊，周作人曾参与编辑。该刊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相标榜，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从第1卷2期起至次年3月第3卷2期终刊，共刊出白话诗近70首。主要作者有康白情、俞平伯、傅斯年、顾诚吾、叶绍钧、汪敬熙、罗家伦、朱自清等人，都是直接受《新青年》诗人熏陶开始新诗创作的。《新潮》上的诗歌以社会题材的作品最有特色。鲁迅曾对该刊的诗歌发表过意见，要求刊载多种风格的新诗，注